

美国“新经济”理论的形成和论争

黄志贤

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 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成就引人注目, 经济增长率比往日都高, 特别是 1997—1999 年连续三年超过 4% 或等于 4% (1999 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曾高达 7.3%)。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在 10 年间 (1990—1999 年) 均下降很多, 前者从 6.8% 降为 3.9%, 后者从 4.9% 降为 2.7%。这种“高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状况恰与 70—80 年代“低经济增长率、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的恶化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 许多人士对此大加赞扬, 并称其为“新经济”。评论新经济问题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一些著名的美国刊物主编或负责人发表的署名文章, 还有一些报刊的经济专业记者、企业家、经济学家也参加讨论。他们所论述的问题归纳起来, 大致集中于这几个方面: 是哪些经济发展趋势促进美国“新经济”的产生? 是哪些因素使美国经济得以强劲地持续扩张? 在知识创造财富的新经济中, 有哪些成功的“新法则”是个人、公司和国家所应遵循的? 新经济新在何处, 它同旧经济相比, 具有哪些不同的特性? 为适应新经济的需要, 应采取哪些具体的政策措施? 新经济能否最后摆脱经济周期——衰退、萧条的困扰, 永远不间断地持续发展下去? “新经济”的出现将会引发哪些社会矛盾? 本文试图通过评价一些知名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争论来理解新经济论的形成过程和基本观点。

一

较早分析美国新经济的一些重要文章如斯蒂芬·谢泼德 (美国《商业周刊》主编) 所撰论文《新经济——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主要阐明了新经济在美国出现是哪些趋势促成的。他认为有两个最重要趋势, 其一是经济全球化, 由于市场力量的巨大、自由贸易的扩展和管制的解除, 使国际贸易和投资在美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以前, 比如进出口已占整个经济的 1/4; 其二是信息技术革命, 数据技术的发展, 不断创造出新公司和新产品, 它已占经济增长的 1/4 到 1/3, 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 取代房屋建筑业和汽车业的原来地位, 并影响其他行业。就是这一信息革命促进资本投资和提高工作效率, 企业通过生产率的提高使成本下降, 库存减少, 在不必提高价格的情况下支付工资增加之后仍能使利润增加。谢泼德认为从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并存这一点就能获知“新经济”存在的“线索”。这把传统的看法即把非通货

膨胀性的经济增长率的极限定为 2% 左右, 当经济增长率达到 3% 或 4%, 便断定通货膨胀率将上升, 经济会走下坡, 完全改变了。他特别指出人们还不知道高技术产品的产出和价格是个算法, 而这类产品的价格总是比上一年的低, 并常常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下降, 可是现有统计资料却没有给予适当的调整, 导致通货膨胀率被夸大了一个百分点, 这表明 GDP 的增长率和生产率实际上要比官方数字高出一个百分点。据此, 他认为“美国经济年增长的极限可能为 3% 至 3.5%”, 就把这个高出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极限, 看为“就是新经济的全部意思”。因此, 他对美国经济前景甚为乐观, 不认为经济的更快增长会引发通货膨胀。

莫蒂默·朱克曼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董事长兼总主编) 也撰文赞扬美国新经济取得“惊人的成就”, 并称这是“第二个美国世纪” (他的文章就是以此为题目)。他同样赞许全球经济和电脑、信息技术的巨额投资对美国经济扩张所起的重要作用, 但是, 他更重视企业管理的变革的重大意义。首先是发扬企业经营传统, 即“重视发挥个人作用、富有开拓精神、重实效创新精神”, 他认为就是这些传统使美国企业界取得成就。他引述人类学家莱昂内尔·泰格的看法, “确立美国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是美国对巨大的市场、遥远的距离, 民族的多样性以及各类挑战所采取的对策”; 这个模式还表明支配企业的是合同和法律、货币化的市场经济, 这些排除了亲属关系、风俗习惯和个人感情的影响; 还有技术和科学管理的信念, 发扬个人开拓精神和创造性。他盛赞在开拓精神和个人创造性激励下的新开公司, 特别是为数众多的较小公司所具有的优点: “灵活性、采取对策迅速、开放性、革新精神和能够吸引最优秀的人员”, 因而, “显示出竞争能力”, 从而为新经济增添了活力。他认为, 现在美国出现的新经济环境是“由下而上”, 它相当于一个“庞大的信息处理系统”, 这个系统“提高了经济吸收、适应和运用技术、信息和后勤革命的能力”, 而那个“由上而下”的系统是应付不了的。正是新经济与美国的传统的结合, 才产生“持久的相对优势”。同时, 越来越多的风险资本投向那些最有创造性的年轻人和那些看来可能是收益最高的新公司; 公司和金融的协作, 也把在传统经济周期中那种难以作出投资决策的格局打破了。最后, 他指出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的调控 (如通过“联储”的利率政策以

防止通胀),而政府只是发挥有限的作用,也是新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看到,朱克曼把美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和持续增长除归功于重视对新技术投入巨资和培训人才外,更多归功于改革企业经营管理手段,特别是发扬创新、冒险精神和减少官僚主义,营造“由下而上”的经济环境,并鼓励中小企业创业,从而以生气勃勃的微观经济来促成宏观经济的成功。

经济学家也积极参加新经济的讨论。莱斯特·瑟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发表了长文——《创造财富——个人、公司及国家所应遵循的新法则》。文中指出人类社会现在已从控制自然财富转变为控制知识了。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就是用知识来创造和增加财富。他发现由此产生的八个成功的“新法则”,那是个人、公司及国家必须遵循的。瑟罗首先要人们认识只有通过新技术变革并由此带来的不平衡状态,才能加速财富的创造,而“攒钱”并不能成为“真正的富翁”。他引证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19世纪90年代)确立了系统化的工业研究与开发的概念,出现公司的产品研制实验室,这就使技术进步成为系统发明的结果;而电气化则产生一系列新的行业(如电话、电影等),并彻底改变原有行业的生产工艺。这两个因素使经济事务发生剧烈的中断和不平衡。这时,高的“不平衡收益”取代了低的“均衡收益”,亿万富翁也产生了。经济环境因技术的突破而不断变化,由“不平衡”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威胁,成功的企业要保存自己就必须“自我毁灭”,也就是摧毁旧的,创造新的。像那些不能造出晶体管以取代电子管和不能造出电脑微处理器以取代主机的企业必然遭到失败。瑟罗还揭示一个社会如果把秩序看成高于一切,那就不会有创造性,但是没有一定程度的秩序,创造性就会消失。要容忍变革带来混乱,否则,新的创意将遭受挫败。要维持适当的秩序,那是为了利用创造性的突破。所以,他强调“创造和破坏是推动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并肯定企业家就是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的核心,是他们把新技术和新概念应用到商业中去。他也明白指出,他们创建的新模式会受到那些保持老模式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创意不被采用,那是有人不想采用,所以,“技术几乎永远受社会的支配”,他为此提出建立一个能让企业家放开手脚去破坏旧事物的社会制度。瑟罗也注意当今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全球化使生产得以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促使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如果所有工厂都竭力扩大生产,世界生产的潜力将比预计的消费多出1/3,就会产生生产能力过剩;全球化也带来惯常工作方式的改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工资压力的减轻,还有新技术新工艺,外包合同以及避免负债等等,都在促使价格下降。于是,他认为“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使资本主义行之有效,要比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使之有效难得多”。他也同样注意一个成功的知识经济需要对教育、基础设施及研究与开发投入巨额资金。尤其注意在进行研究之后接着为新开发的技术在经济中扎根而展开活动的问题。鉴于研究与开发的社会收益率比私人收益率要大得

多,但出钱的公司收益小,只愿花极少的钱并集中于开发这一端,这就要求政府把钱花在推动基础知识进步的长线项目上。瑟罗从更宽广的视野探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提出的若干重要问题,其中关于知识创造财富,关于个人创业精神是变革的动力不是什么机构因素所能取代的,关于秩序与创造、破坏之间的关系,创造和破坏是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等的论述,给人有益的启示,因而引起广泛的注意。

随着近几年来因特网,特别是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以及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主导的科技市值飙升,一些学者如曼纽尔·卡斯泰尔(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被视为“网络社会”最优秀的思想家之一),便宣称一个“新时代”——“信息资本主义”的来临。他在1999年回答法国《解放报》记者的提问时概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有二:一是因特网的大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新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在企业中占据应有地位,这引起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他列举电子商务,生产和供应指令的自动化、分包加工等;另一是因特网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国界,如印度或中国的工程师可在网上为远在美国的“硅谷”工作,美国劳动市场向移民开放,以引进有技术的劳动力。这两种变化使生产率有着极大的增长,这就是新经济的第一个主要特点。现在,人们以为网络公司的股票上市,其股价会“超速运转”。为什么会有这个看法?卡斯泰尔解释道,那是因为“价值的计算方式发生了变化”。在以前是“以短期的利润前景”作为计算的基础,而现在是在“以人们认为这些企业在经济关系即将发生改变的新世界里将扮演的角色”作为基础,于是就出现投资者对往往是大量亏损的企业感到兴趣的现象。这种价值创造的不同是新经济的第二个主要特点。他认为新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发展趋势在“硅谷发展模式”中展现出来,那是带有“个体色彩的、分散的资本主义”。他竭力赞扬“分散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率很高、创造力很强、社会学方面很有价值和信奉绝对自由主义的制度,它能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他对硅谷实行的投资和分配制度也十分赞赏,那里的大部分报酬是企业优先认股权和股份,于是雇员更多感到自己是股东,而非单纯的领取薪金者。如果他把手上股票卖掉便很容易立即进行新的投资,因为通过因特网就可从一个公司转投到另一个公司。所以,卡斯泰尔说:“通过因特网,所有人都可成为资本家!”但也无法掩盖他对网络社会将会加深社会鸿沟的忧虑。

1996年以来新经济在美国内外已成为一个广泛流行的名词(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12月30日一期最早使用“新经济”一词),可是当人们问到新经济究竟新在何处时,得到的答案并不十分明确,学者也各有各的看法。这里,罗伦斯·萨默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后任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对这方面的研究值得一提。不久前,他在美国旧金山一个科技年会上发表有关新经济的主题演讲,集中探讨新经济新在何处,它具有哪些新的特性,它与旧经济有哪些差异和联系,因应新经济的要求应采取哪些有效的策略措施。他

指出:新经济的“新奇之处”就在于“由生产实体产品的经济转移到奠基于知识的生产与运用的经济”。旧经济生产的是“实体产品”,新经济生产的是“知识产品”。他认为产品不同,地位也不同,知识产品的地位比实体产品升高了;它们各自的经济价值本质也不同。实体产品的价值决定于它的“实际重量”,而知识产品的价值决定于它“内含的知识”。知识产品的特性是像制药、书籍、唱片的特性那样,含有很高的固定成本和很低的边际成本。他强调“这些特性对于商业以及整体的动作都具有关键的意义”。价格必须弥补高昂的初期固定成本,不会被压低至边际成本。为此就要取得暂时的垄断力量,这成为生产任何商品的“唯一诱因”。他说:“不断追求”垄断力量成为新经济的核心动力。这种动力所导致的创造性毁灭,成为经济成长的主要刺激。他认为新市场的功能是来自垄断。这就把农业与工业经济和新经济分别归属于不同的学派,前者属于斯密学派,后者属于熊彼特学派。斯密模型表明供给随价格上涨而增加,但需求则减少,供求不平衡会恢复平衡,这是一种“负向回馈经济”。新经济则是需求增加会创造更高效率和更高报酬,而价格下降还会创造更高的需求,这是一种“正向回馈经济”。萨默斯指出:当市场是由“正向回馈”所驱动时,它的效率会与规模成正比,它会发展出更大的网络和更大的生产线,能够补偿高昂的初期固定成本,增加效率,减少平均成本,所以是“成功创造成功”。他把信息社会经济政策隐喻为“大雪崩”而非“恒温器”,认为那是更诱人的。旧经济同新经济的另一个差别:在传统工业经济中,发生供求失衡后,只能通过价格调整来恢复平衡,这被称为“牛顿式制衡系统”;而新经济则是“适者生存,胜者全得”,因此被看作“相对属于达尔文式的”。萨默斯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新经济是建立在传统价值观之上的:节俭、投资以及听任市场自行发挥作用”。他在这次演讲中又重提这个观点,他从美国历史上科技发展说明新经济是需要不时更新的,这“唯有在旧价值的基础上,才能达成这点。在演讲的结束语中把什么是“旧价值”表述更明白,“我们必须专注于确保新经济系建构于可以呼应新经济需求,以及让市场变得最大、最有效率的种种旧美德与投资之上”。这些体现在他为因应新经济需要而提出的五项具体政策中,即:(1)财政纪律上强调创造盈余和遵循谨慎政策的重要性;(2)最重要的投资是投资于人脑,而教育能对此作出最重大的贡献;(3)以任何方法扩大市场规模,要支持国际贸易,重视全球规模;(4)把市场和竞争作为知识的最好生产者,把创新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5)要使新科技和新市场对大家都有好处。萨默斯的理论分析已不再只是一般简单把产业分为传统产业与新产业,然后把旧经济与传统产业划等号,把新经济与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划等号。而是从分析传统产业的实体产品同新产业的知识产品的各不相同的特性出发,揭示它们创造价值的过程及其与旧价值的联系和分属于不相同的经济理论模式。虽然“正反馈”经济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网络时代的经济模式时已提出来了,但萨默斯把这一分析与新旧经济

的差异密切联系起来,特别是因应新经济的需要而应采取的策略,这些确实推进了新经济的理论分析。

鼓吹和拥护美国新经济论的人并不讳言新经济会引起若干社会矛盾,甚至重大的国际经济问题。瑟罗注意新经济中出现的劳动问题,如美国近年来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因缺乏接受在职培训以获得新技能的机会而使工资差距拉大。他揭露公司在新知识使老技术变得过时,便雇用掌握这种新知识的员工,以避免支付再培训费。这样,以往的技术阶梯和终身员工就不复存在了。瑟罗指出:个人要想在不存在终身职业的知识经济中拥有一种终身职业,那是个“最大的未知数”。瑟罗还特别关注知识经济时代尚未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其一,技术进步产生的全球经济正在变得无法控制而使各国政府萎缩,同时,全球公司不受政府监督,权力扩大了,它可迁往最有利的投资地点并在竞争中挑动一些国家反对另一些国家;其二,国家之间、公司之间、个人之间不平等经济现象在加剧,表现在“资本收益在增加,工人收益在减少”。他担心国家政府在管理经济制度的能力丧失之后,限制经济不平等的能力也会跟着丧失,他预言:“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会生活在一个普遍存在着更大的不公平的世界上”。卡斯泰尔在赞扬“信息资本主义”的同时不得不承认“新经济确实在加深人们之间的鸿沟”。社会上分成两类不相同的人:一类人拥有个人资本和受过相当水平的教育,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由于他们拥有技术和知识,因此有能力投资赚钱。另一类人却没有这些能力,因此只好置身于这个游戏之外。这两类人之间的鸿沟将会越来越加深,他在宣传他那个“分散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时也表示担忧:如果听任这个制度自由发展和没有制度制约、社会控制,那就“可能变成极端个人主义和具破坏性的制度”。杰弗里·萨克斯(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国际贸易学教授)以《一幅新的世界地图》为题论述现今技术进步引起的全球分化。他指出:“全球分化的核心是在创新和技术普及方面的极不平衡”。他提出“技术隔断地区”理论来论证这点,突出地理环境状况使世界相当一部分地区不毗邻大市场,也不在沿海港口,而是远离海洋的内陆、边远山区,因此,技术难以进入,而且经济落后,很穷困,原来出口的许多初级产品为新的合成材料所取代而使贸易量不断下降。穷国买不起国外技术,也无法进行研究和开发,这些贫困地区便成为“受排斥的技术隔断地区”。他揭示地球上只有一小部分人,约占世界人口的15%,提供了世界几乎所有技术革新,而占世界人口的一半的第二部分人在生产和消费中能够采用这些技术,但是,剩下的那部分人,约占世界人口的1/3,却“与技术无缘,既无法在国内进行创新,也无力采纳国外技术”。这就是说,世界上有20多亿人,“将无法分享全球增长带来的好处”。为此,他要求富国彻底改变国际战略,增加对穷国的技术援助,“在鼓励创新和维持最贫穷者利益之间需要一种更好的平衡”。由此可见人们对新经济的发展可能加深国内各阶层之间和国际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种种矛盾是心怀疑惧的。

二

有些人士认为美国官方公布的有关经济增长率的统计数字偏低,这与基于信息技术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实际情况不符,提出应对原来数字加以修正。像上面提到的谢泼德就是这么看的,认为美国GDP的增长率比官方宣布的实际要高1个百分点,那么,年均增长的极限为3~3.5%,但在此前的18个月中却把增长率定在2.5%,定低1个百分点产出就会失去1500亿美元,失业率就会高出半个百分点,失业将达到75万人。美国“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他的同僚也认为由新技术产生的生产率繁荣让经济发展在没有引起价格和工资的异常增加的情况下有较高的增长是可能的。在他们看来,在没有发生较高的通货膨胀情况下,一年增长的程度就不是2%,而是3%或更多(甚至接近4%)。这个超出的1%转变为GDP,10年完了就是较高的(1万)千亿美元,¹⁰他们对官方低估有关统计数字的批评引起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商业部的注意,为消除批评者的非难,设法对统计数字作了修正,就是把企业在软件上的所有商业开支现在视为投资而非成本,也就是首次将其当作GDP的一部分。这样,统计数字经过一番修改之后,信息技术部门的投资规模便增大了,近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提高了。然而,在1999年10月28日公布修改过的统计数字后的第二天,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批评文章:《对经济的比较明确的看法》¹¹,大泼冷水,指出那些经过修改的数字,“仍然没有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先前的一些兴旺时期所达到的繁荣程度”,批评“新经济仍然是梦想,而不是现实”。虽然该文相信美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投资、生产率,消费开支都上升一些,通货膨胀下降一些,但指出用新方法计算的1998年生产的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总价值约8.76万亿美元,这比旧方法计算的只多出2480亿美元,因此,认为“经过修改的数字并没有达到取得突破以进入期待中的新经济乐土的地步”。该文更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引述美国商业部分析局局长史蒂文·兰德费尔德说的话:“近几年来增长率只是提高出百分之零点几,但是长期的趋势并没有什么变化”。美国商业部公布的新数字也引起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关注,发表的评论文章也指出:关于数字经济是“言过其实”,实际上其规模要比人们认为的小得多¹²。

至于这个时期生产率(每小时生产量)的高速增长,也有人质疑,罗伯特·戈登(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虽然也承认美国GDP的潜在增长率由2%到2.5%提高到2.5%至3%,但是对“新经济—信息技术革命使整体经济更具生产率”的看法表示怀疑,他用“无底深渊”来形容自1995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表现,认为“不令人欣赏”。他揭示1995—1999年间非耐用品制造业生产率增长情况同1972—1995年间的相比,前者生产率的增长减慢了,电脑之外的耐用品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甚至更加减低。¹³他在新近发表的文章¹⁴中又指出:“计算机并没有推动美国生产率的高速增长,使之摆脱从1972年到1995年这些年头的不景气。”他剖析1995年

底以来美国生产率加速提高的真实性。当时美国生产率是以2.75%的年率提高,而1972—1995年间生产率增长年率仅为1.42%。这就是说,前者比后者多加速1.33个百分点。他对加速的成因作了一番分析,先考虑周期因素,作若干扣除后把生产率的加速减少到0.64个百分点。他认为那是几乎完全在耐用品制造业中实现的,这里“包括电脑硬件业中技术变革的加快所贡献的0.29个百分点和来自耐用品制造业其余部分中技术开发加速度0.28个百分点。”那么,除去耐用品制造业之外,他得出美国经济其余88%部分的加速度剩下的就只有0.07个百分点了,实在是“微不足道”啊!本来按经济学的标准算法,在电脑上投下的大量资金所产生的“资本深化”效应,会使生产率提高速度增加约0.33个百分点,可是依据戈登的计算却只有0.07个百分点。他联系对电脑能力的回报以空前的速度减少这一情况来解释,并揭示造成这种情况的四个因素:保护在市场上所占份额、旧有活动的繁衍、活动的重叠、个人网上冲浪严重分散职工精力。他对“新经济”所作的批评是:“新经济并没有很多内容。”戈登被美国学界称为生产率权威,对生产率计算有其科学依据,值得重视。有的学者对这个问题另有解释,认为技术革命对生产率的推动不会在短时期里全都充分显示出来,它延续的时间可能是几十年之久。保罗·戴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史家)发现美国经济从1880年到1920年即延续了40年之久,电气化的潜力才得以充分的利用。对于信息技术,他认为也会延续类似那样长久的时间¹⁵。

在批评新经济的行列中,还有米尔顿·弗里德曼(现代货币主义的主要代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约翰·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等更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他不认为美国出现了“新东西”。他指出1929年股市崩溃前夕,美国伟大经济学家之一费希尔在一份报告中对技术革新、企业合并和全球化已作了描述,在今天这些被称为新经济的每个因素在2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所以,他不认为美国人生活在“新经济”中。记者问他,哪个是美国经济的真正危险?他回答:经常项目赤字和消费兴趣增强都不是,股票市场的迅猛增长才是“最严重的问题”。这与20世纪美国在20年代和日本在80年代的情况非常相似,它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受到生产率的提高和其他技术改进的推动”。20年代和80年代是汽车制造业,90年代是信息技术。他虽然也承认股票的牛市有其正确的一面,就是因特网和计算工业的迅猛发展,改善了资本的生意,但是股票市场发展过快就会出问题。他指出美国股市已“显示出一些泡沫的特性”,预言美国股市将经历行情暴跌,这就是美国经济繁荣的“真正危险”¹⁶。加尔布雷思也有弗里德曼相似的看法,他在2000年初接受日本记者的访问时指出:“资本主义的特征是,泡沫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破灭”,那种认为美国今后还会保持经济繁荣状态的看法,“未免过于乐观”。他认为美国现在的情况与1921—1929年的繁荣期很相似,继续保持繁荣的观点占据时代的主流。众多的个人

投资者通过因特网进行投机性的股票交易,他们的资金已经“远远超过投资信托的承受能力”。一些“过火”的做法在泡沫经济破灭了或许会得到纠正¹⁷。类似担心新经济是泡沫经济的人为数不少。这受到大力宣扬新经济成就的《商业周刊》的批评,它以社论形式斥责这种把新经济看为“注定要破灭的股市泡沫”的看法是“荒谬”的,它称赞“新经济正是长达400年的一种现象——资本主义——的最新体现”,甚至说:“让新经济全球化”¹⁸。

三

在新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对美国经济扩张能否不间断地持续下去,从此经济周期是否归于消失的问题,一直成为美国学界和企业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那些“乐天派”对新经济前景充满着乐观情绪,早在1997年初当美国经济增长持续了6个年头时,就出现一种看法:经济周期已被“驯服”了,以往那种周期性的繁荣和衰退已不会再现了。在再经历近两年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之后,经济周期消失论的调门更高了,这时,布赖恩·韦斯伯里(美国芝加哥格里芬—库比克—斯蒂芬斯—汤普森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宣称“美国已经进入一个刚刚开始的新财富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通货膨胀不会上升,衰退不可能出现,股市也不是泡沫。他认为这是由于“当前创记录的经济复苏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技术、全球化、财政政策和低通货膨胀——都表明,将来利润、收入、就业机会和股票会继续增加和上升”。他指责那些对美国经济前景持悲观主义观点的人是犯了马尔萨斯传统观点的错误,批评他们不懂得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他指出每天都有新软件或者在线应用程序被发明,或者有更多的信息被添加到万维网去。就因为有这样的缘故,计算机并不像马尔萨斯那个收益日渐减少的世界里的机器那样在日益贬值,实际上它是“一种日益增值的资产”。他表示赞成美国商业部对GDP统计数字的修改,把软件改为投资,这清楚地表明计算机对经济的影响。最后,他认为在非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背后是有“真正的原因”的,只要“不重复过去的错误,这种增长就会持续下去”¹⁹。

另一些学者不认为经济周期已经消失了,只是在新经济条件下,那些新产生的经济因素对经济周期遏制作用加强了,使经济波动现象较前大大减少,经济平衡增长的时间有所延长。在1997年关于经济周期的辩论中一个被用来支持经济周期缓和的主要论点是库存量减少。刚才提及的韦斯伯里也曾认为商品库存是“经济平稳现象的背后因素”,但他却断言“衰退不可能出现”。小威廉·佩塞克也指出美国企业界对商品库存量的控制取得了进展,这种进展却“大大有助于减少经济起伏不定的现象”。在以往企业对供求力量的判断错误而造成商品库存过多或过少,这就会在经济衰退、经济蓬勃发展和通货膨胀的突然出现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而在现在企业却能够作到更充分地利用技术,还有更好地预测到消费者的需求和行为,这样,就可避免判断上的失误。企业控制好商品库存量,便能迅速地适应经济的变化,从而增强

灵活性和竞争力。所以,他认为正是这个“及时库存商品”的方法,使经济得以稳定下来²⁰。主张同样观点的布拉福德·德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史学家)也认为企业的仓库储存大量减少,对于整个经济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的可能性也会大为减少²¹。乔纳森·彼得森认为由于这几个因素起作用,如“联储”吸取了以往教训,计算机技术使管理产品和材料流动的方式出现革命,债券市场成为重要的减震器,服务业不容易大起大落,使现在经济与以前的不相同,衰退将会“较温和,时间更短和更加罕见”²²。艾伦·布林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也肯定地认为21世纪的经济衰退同上个世纪的不会一样,它将是“不那么经常,不那么严重”。不过,他对服务业的需求同对商品的需求,其周期性波动要小得多是否总是如此,没有回答,只说“这是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²³。另一些学者把经济周期同特定的货币政策联系起来考察。马丁·费尔德斯坦(前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认为美国出现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联储”采取紧缩,由于“控制住通货膨胀,这给我们较大的稳定性”。约翰·泰勒(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美国近年来情况特别好,货币政策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带来价格的稳定,这本身就使生产率提高。

分析经济周期新变化的人更多是将其与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联系起来,他们也认为经济周期不因信息技术革命的出现而消失,而且认为经济易受衰退的打击。迈克尔·曼德尔在1997年提出“新经济周期”论,他认为股市、库存、甚至通货膨胀都不会决定这次经济增长的持续时间,会起决定作用的是高技术。现在出现的新经济周期就是“与高技术部门健康息息相关”。由于高技术部门已“达到如此举足轻重的程度”,使现在经济容易受到高技术衰退的打击。高技术产业比汽车产业更容易波动,且波动幅度更大,它还会影响到其他经济部门。因此它的衰退趋势会对就业、投资以及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²⁴进入2000年之后,尽管美国经济还在增长,曼德尔仍坚持他的新经济周期论,认为“新经济绝不排除经济周期的存在”。坦言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使经济处于剧烈下滑的较大风险中”。他指出在经济周期的低潮中,高技术部门会受到固定成本和收入减少的双重打击,其利润和就业岗位的下跌幅度会比传统行业更大;而信息技术所吸收的资本设施的全部开支几乎占了一半,要保持现在两位数的增长越来越困难,技术开支增长放慢,技术股价将被迫大幅调整,这使消费者的收入不稳定加剧,在需求减少时企业可能发生“诈钱”的“收入大屠杀”;还有“联储”和政府采取“有悖常理”的政策(如提高利率和削减政府开支)等。他预言“要不了多久,新经济繁荣很可能被新经济萧条取而代之”,并警告“这是一场可能比大多数人预料的程度要深得多的衰退和股市下跌”²⁵。斯蒂芬·罗奇(摩根—斯坦利—迪安—威特金融咨询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也发出警告:金融市场的泡沫足以引发一场重大危机²⁶。股市真的下跌,而且是大暴跌,从2000年4月10日至14日的五个交易

日发生股价创记录暴跌,纳斯达克指数、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500种指数的跌幅,分别达到25.3%、7.25%、10.47%。股票市场价值下跌总计近两万亿美元。但在17日股市又“强劲反弹”。一些经济学家和金融分析家认为这次美国股市暴跌,纠正股票市价估值过高,消除过多的泡沫成份,这有其积极意义。布鲁斯坦伯格(美国美林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也说:“美国的经济基础仍然坚实,技术部门尤其如此”¹⁷。虽然未发生危机,但是,经济增长的时间越是长,人们对经济衰退将在何时来临就越是担心。况且还存在经常项目收支赤字巨大,私人净储蓄锐减,内外债务激增,劳动市场紧张等,这些都是导致经济失衡的重要因素,如果情况得不到任何改善,对周期性衰退的隐忧就难以消除。

四

一个新的经济理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总是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并且理论也显出粗糙、简单,新经济理论也莫能外。至今尚没有一个为人们普遍认同的新经济定义,萨默斯说:“新经济的概念既明确又模糊,时常被人宣扬,却很少有人加以定义。”¹⁸美国柯达公司总裁答中国记者问也承认“现在对于新经济这个名词的定义还没有明确。”¹⁹多数人谈到新经济就把它同高科技—信息技术、因特网等直接联系起来,也就是把新经济的出现完全归于技术这单一因素。有的人却认为引起90年代美国经济新变化,除技术这一关键因素之外,在经济体制中还有同样是关键的许多因素在起作用。对一些具体的又是颇重要的经济问题既可从新经济去解释,也可从既有的经济理论去解释,如这个时期的失业率甚至低于它的自然率水平,但是通货膨胀率也保持在低水平上,新解释是由于因特网技术的应用,促使商品的价格下降,所以,失业率虽低,却没有导致通货膨胀上升;既有经济理论的解释是,由于工人和经济学家对生产率的提高感到意外,以致没有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究竟哪个解释更恰当,学界仍“迷惑不解”²⁰。保罗·克鲁格曼对失业率保持在很低水平,而工资却很少变动这一情况认为那是“比生产率更大的一个谜团”,他试图另从劳动市场和人口变动来解释。此类问题,还可举出一些,这表明与新经济有关的新问题在理论分析上仍遇到不少困难。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格伦·凯斯勒在报导克林顿总统2000年4月5日于白宫召开有著名高科技公司巨头、财界高级官员、银行家和经济学家参加的新经济讨论会一则消息中就坦率地指出:“经济学家对目前经济的性质看法不一,甚至无法确定这是新经济,还仅仅是非常坚挺的旧经济”²¹。在新经济兴起后,就有不少人预言新产生的新产业将淘汰、取代传统的产业,但是,在90年代末已有迹象表明:那些传统产业也日益广泛地运用电脑、因特网等数字技术工具来改进自身的生产组织和营销活动,以增强市场的竞争力;此外,新旧产业部门的公司互相通过并购等方式,进入对方领域,这使新与旧产业部门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了。因此,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使新经济理论的分析更复杂了。

新经济也决不是像拥护的人赞颂的那样,尽是令人喜悦

的东西,其实,也有令人不安的一面,还有不少问题有待搞清楚,凯斯勒陈述白宫新经济讨论会是要讨论“新经济的一些长期令人不安的情况和没有解决的问题:它的力量在哪里?它给国家造成什么损害?谁被抛在后面?”²²随着2000年以来,股市动荡加剧,经济增速放慢,网络公司连连受挫,或被并购、重组,或倒闭,还有社会分配差距更加加大等等,这些引起英、德、日等国一些著名报刊发表文章,对美国新经济提出质疑,甚至指谪对信息技术革命有“夸大”、“炒作”之嫌。美国这次经济繁荣持续的时间在历史上确是最长的,难道是单单靠信息技术就能作到的么?!争论双方目前尚没有一个能够透彻说清这个问题的令人信服的理论。无论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否称得上一次革命,但它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积极的东西,在发达国家人们已感受到它对经济活动、生活方式,乃至政治、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产生的深刻影响,发展中国家也正在感受其影响。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今世界潮流中,我们必须面对着它,认真认识它,深入研究它。

注释:

- [美]《商业周刊》,1997年11月17日。
- [美]《外交》双月刊,1998年5—6月号。
- [美]《大西洋月刊》,1999年6月号。
- [法]《解放报》,1999年7月5日。
- 28 2000年5月1日在美国旧金山第28届大通H&Q科技年会上的演说:《国家的财富》。
- [英]《经济学家》刊,2000年6月24日。
- 10 欧文·厄尔曼、劳拉·科恩、迈克尔·J·曼德尔:《联储的新规则书》,载[美]《商业周刊》,1999年5月3日。
- 11 [美]《纽约时报》,1999年10月29日。
- 12 [英]《经济学家》周刊,1999年10月30日。
- 13 [英]《经济学家》周刊,1999年7月24日。
- 14 [英]《金融时报》,2000年7月26日。
- 15 21 [德]《经济周刊》,1999年5月22日。
- 16 [德]《商报》,1999年9月2日。
- 17 [日]《朝日新闻》,2000年1月18日。
- 18 [美]《商业周刊》,2000年1月31日。
- 19 布赖恩·韦斯伯里:《别害怕,不会发生通货膨胀》,载[美]《华尔街日报》,1999年10月21日。
- 20 小威廉·佩塞克:《控制商品库存量使经济稳定下来》,载[美]《华尔街日报》,1997年8月29日。
- 22 23 乔纳森·彼得森:《美国经济是不是已经进入黄金时代》,载[美]《洛杉矶时报》,1999年6月27日。
- 24 迈克尔·J·曼德尔:《新经济周期》,载[美]《商业周刊》,1997年3月31日。
- 25 迈克尔·J·曼德尔:《繁荣变成萧条的危险》,载[美]《商业周刊》,2000年2月14日。
- 26 见[美]《国际先驱论坛报》,2000年4月6日。
- 27 见[法]《法新社纽约》2000年4月17日电。
- 29 见[中]《国际商报》,2000年7月4日。
- 30 31 32 格伦·凯斯勒:《决策者苦苦思索“新经济”——白宫开会研究变化》,载[美]《华盛顿邮报》,2000年4月5日。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系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金萍)